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的青年研究与青年学

■ 何绍辉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003)

【摘要】改革开放为中国青年研究尤其是青年学的构建和发展创设了有利条件,青年研究与改革开放整体上同频共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学术界在青年研究学科化以及青年学构建上做出了不懈努力,有力地推动了青年学学科化进程。深化青年基础理论研究,需要多学科参与和融合。推进青年学学科化、专业化发展,是青年研究走出困境的现实需要,也是青年学学科构建与发展的历史必然。

【关键词】改革开放四十年 青年研究 青年学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18.05.002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中国社会发展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时至今日,我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四十年的辉煌历程。四十年来,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政治、社会、生态和文化发展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是此种变化的具体表现,“巨变”是理解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与变迁的重要关键词。青年作为时代发展进步的主要推动者,在改革开放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广大青年得到了青年研究者的应有关注,也成为中国青年研究关注的重要主题。总结四十年来我国青年研究发展演进的轨迹、经验及其基本规律,对于青年研究的深入推进和青年学的学科化发展意义重大。

一、青年研究与改革开放同频共振

青年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中一门特定学问的出现和发展,在中国历经了一百年的发展变迁。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发端与兴起(1915-1949年)、发展与曲折(1949-1978年)、繁荣与深化(1978年以来)三个时期^[1]。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和社会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中国青年群体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整体来看,中国青年与改革开放同行,中国青年研究与改革开放同步,可谓“同频共振”。

首先,改革开放催生了青年研究队伍、平台等的发展壮大。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昭示着中国社会进入新阶段,中国青年研究迎来了春天。这突出地表现在:(1)青年研究队伍的

收稿日期:2018-06-25

作者简介:何绍辉,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青年理论与发展。

稳定与壮大。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共青团中央联合发文成立青少年研究所,尽管因为理论研究与共青团工作的渐行渐远,后来青少年研究所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但此后共青团中央成立了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成为国内青少年研究的重要机构。另外,还有各级社科院系统、共青团系统以及高等院校中的青少年研究所、青少年研究中心等也成为青年研究队伍的集聚地。虽然近年来青年研究机构有整合的趋势,但青年研究队伍整体上仍然具有较大规模,且渗透和分布在各个系统之内。(2)青年研究平台的不断打造。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青年研究类刊物如《青年研究》《中国青年研究》《中国青年社会科学》《当代青年研究》《青年探索》《青少年犯罪问题》《北京青年研究》《青年学报》等陆续创办、改版,质量不断提高,刊物的专业化追求越来越明显,青年类刊物的更名便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变化。比如2014年,《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更名为《青年学报》,《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更名为《北京青年研究》;2015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更名为《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7年,《江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更名为《青年发展论坛》等。(3)国家对青年研究支持力度的加大。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高度重视,对青年研究的资助力度日渐加大。以支持力度相对较大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为例,近年来尤其是2011年以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对青年研究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每年立项都在20个项目以上,其中2015年以“青年”和“青少年”为主题的研究立项就多达51个。

其次,改革开放加速了青年学学科化进程。改革开放之初,不少学科得以恢复和重建。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学科建设热潮,中国青年研究学科化的冲动使得青年学构建问题成为学者们关注和探讨的重点。20世纪80年代初期,很多学者开始关注和力推青年学的学科化。例如,王金池在《青年研究》1983年第8期发表了《开展“青年学”研究势在必行》的论文,认为创立“青年学”是社会发展的需要;黄志坚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发表的《论青年学的形成和发展》、谢昌逵在《当代青年研究》1987年第11期发表的《关于“青年学”》等都是在探讨青年研究学科化和青年学建设的问题。经过四十年发展和推进,青年研究的学科化不断被重视,青年研究的范畴、理论、方法和框架等青年学基础理论问题不断明晰,青年研究的学科化、专业化程度不断加深。从青年研究学科化历程来看,青年学的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推动,改革开放后的学科建设为青年研究学科化提供了重要机遇。尽管对中国青年研究学科化至今仍存有异议,青年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发展境遇还不是特别令人满意,但青年学学科化发展的成绩以及学者们在推动青年学构建上的努力是不容忽视的。

改革开放对中国青年研究的影响还体现在,改革开放形成和推动了以青年为主题的研究。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短短四十年之内,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乡土中国向城市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和发展。在转型和发展过程中,青年群体自身也发生了一些分层、分化,形成了与改革开放特质相符的特殊群体。学者们围绕改革开放以来新出现的青年群体、青年现象和青年问题,形成了特定的青年研究主题。总的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的青年研究主题,集中体现为:

青年群体研究。青年作为特定群体并非“铁板一块”,庞大的青年内部存在分层和分化,存在着巨大差异。其中,因为改革开放所导致的经济、社会变化使青年群体分层和分化,形成了诸多特定青年群体,这些特定青年群体自然成为了中国青年研究的主题。比如,因为劳动力的城乡流动而形成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自从2001年王春光提出新生代流动人口概念以来^[2],便成为青年研究的重要主题。研究者们重点分析和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生活态度、生活境遇、社会融合、心理特征及其身份认同等问题。又比如,与改革开放同成长的“80后”“90后”群体研究。学者们从代际差异的角度,对“80后”“90后”的群体特征、行为模式、心理状态及其形

成的特定青年文化展开了探讨。这方面 李春玲等的《境遇、态度与社会转型:80 后青年的社会学研究》就是代表,该书全方位展现了“80 后”青年在社会变迁背景下的生活境遇及他们的应对态度,重点分析了“80 后”群体的内部差异、“80 后”大学生的生活境遇及“80 后”青年的社会政治态度等。再比如,因生育政策调整所形成的独生子女研究。中国的人口控制虽早于改革开放,但是人口控制较为成功和产生重大影响却是在改革开放时期。因此,独生子女研究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青年研究的重要主题。风笑天等学者对独生子女成长、居住方式、社会化以及家庭结构变化等进行了长期的深入研究。此外,还有留守儿童、大学生等也都是改革开放以来青年群体研究中受关注较多的群体。

青年现象研究。学者们针对青年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与社会发展规律、青年成长规律不一致的青年现象进行了广泛研究,此类研究往往以青年问题为主,因此又可以称之为青年问题研究。比如城市街角青年研究,黄海、符平、马德峰等人借鉴怀特《街角社会》一书中的分析框架和视角,对城市社会发展中所浮现的街角青年的特征、构成、社会心理与生活方式等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又比如乡村“混混”研究。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出现了诸多问题或者说麻烦,乡村“混混”就是典型。学者们主要探讨了乡村“混混”的形成、发展与壮大,乡村“混混”与基层治理的关系以及乡村“混混”与乡村治理转型的关系等问题,为更好地理解转型中的中国乡村社会提供了重要视角和启发^①。此外,还有空巢青年研究、青少年犯罪问题研究、留守儿童研究、流浪儿研究等,这些都是对社会转型中特定青年现象所开展的针对性研究。这些研究不仅为我们更好地理解青年提供了重要理论、视角和方法,也为我们更好地解读社会提供了重要切入点和向度。

青年理论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青年研究,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学科恢复和重建过程中的青年理论研究,其中包括青年学研究、青年元理论研究等基础性研究。以青年学研究为例,学者们围绕青年学构建的可能、条件与要素、到底存不存在青年学、青年学学科化的困境与推进路径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比如,黄海的《从青年研究到青年学——一种真问题与真学问相结合的文化人类学反思》(载《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6 期)、张荆的《青年学的构架与范畴》(载《青年研究》1987 年第 4 期)、沈杰的《青年研究“何去何从”》(载《中国青年研究》2002 年第 1 期)、陆玉林的《青年研究:学科逻辑与问题意识——论对改革开放以来青年研究的反思》(载《当代青年研究》2007 年第 5 期)等。此外,关于什么是青年、青年性、青年发展以及青年期等青年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更是为我们正确认识青年、理解青年和解读青年提供了基础性理论。

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的青年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青年研究与改革开放同向并行、整体推进。改革开放以来的青年研究,并不只是有关的“青字号”研究,其他的很多研究如教育不平等研究和网络文化等亚文化研究,本质上也都是青年研究。虽然这些研究关注的是一般性社会问题,却指向青年群体。毕竟,不少社会性问题,实质上是青年问题,比如农村光棍问题,其实更多的还是农村青年婚恋问题。因此,社会问题青年化和青年问题社会化是青年研究所关注的,也是尤为值得重视的。

二、青年研究的学科化及其努力

自从 18 世纪产业革命兴起,现代意义上的青年概念出现,以青年为研究对象的青年学慢慢

^① 如黄海的《灰地:红镇混混研究》(三联书店 2010 年版)、陈柏峰的《乡村江湖:两湖平原“混混”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等就是代表。

成长起来。国外青年研究或者说青年学的出现、兴起和繁荣要早于国内。因此,改革开放初期,在学科恢复与重建过程中,学者们极力推动青年研究的学科化并作出了有效努力。青年研究或者青年学的构建,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对国外青年学研究成果的推介。比如,黄志坚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发表了《国外青年研究学科化的历程》,介绍了国外对青年进行单学科研究的几种范式、青年研究的走向与趋势等。陆建华在1987年《青年研究》第11期发表《国外青年研究学科化历程的方法论思考》,从方法论角度对处在“超前学科时期”的青年研究特点进行概括,并分析了国外青年研究方法“由研究的单一性走向综合性、由终极论走向多元论、由现时性研究走向历时性研究、定量化的经验研究与理论建构的结合”的趋势。

1988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黄志坚教授的《青年学》一书出版,标志着我国青年研究学科化的正式开始。此后,有关青年学的研究论文和专著不断涌现。如《青年学新论》《青年社会学》《青年学导论》《青年行为学》《青年组织学》《青年心理学》等。与此同时,围绕青年学学科化及青年基础理论研究的学术会议与论坛亦不断增多。理性观之,尽管有以“青年学+”命名的专著和研究成果不断推出,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青年学的学科地位问题。作为对青年学学科化的探索,尤其是关于青年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思考,说明青年学还处于寻求依托和认可、认同阶段。这种表现的核心就是学科归属的争议。正因此,青年学往往被置于其他“母”学科之下,其中又以青年社会学的发展较为突出。正如有学者指出:“近年来,社会学视角的青年研究迅速发展,在青年研究领域占据主导性位置,社会学取向的青年研究往往引领着青年研究的主流走向。社会学对青年研究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研究方法上,同时也反映在研究主题上。”^[3]

尽管对青年学的学科归属、学科性质、学科规范以及学科要素等存在诸多争议^[4],但是青年研究者在推进青年学学科化上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一是对青年学学科意识的唤醒。特定的学科意识是一门学科有别于其他学科的根本标志,是衡量一门学科是否规范、是否成熟的重要尺度。青年学要成为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社会科学学科,就要树立特定的学科意识和学科视角,要在青年学学科意识、学科自觉上着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青年学学科化建设获得了长足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青年学学科意识的唤醒。青年研究者出版的专著、发表的论文以及组织的会议等,较好地推动了青年学学科意识的萌发与扩散。二是对青年学学术共同体构建的推动。一个学科的成熟和发展,必须有由专业人员组成的学术共同体,有专业的学术期刊作为学术交流和探讨的专门平台。在这方面,改革开放以来,青年研究不仅创办了诸如《青年研究》《中国青年研究》《当代青年研究》《中国青年社会科学》《青年探索》等青年学成果讨论和交流的阵地,而且形成了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青少年研究会、青少年基础理论研讨会等重要组织与力量,组建了青年研究学术共同体,较好地推动了青年学研究成果的交流与探讨。最近,中国青少年研究会青年学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为青年学和青年工作搭建了良好的交流平台,是青年学学术共同体建设的重要体现。三是对青年学学科实践的努力推动。学科的成熟与发展,离不开学科实践的生发。“上海交通大学率先开设《青年学》课程,青年教师胡近担任主讲教师,课程采用了专题讲授与课程小论文的形式,讲述了科学青年观、青年自我意识、青年心理特征等专题。”“青年学作为一门学科,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已经登上了大学的讲台,湖北青年职业学院、陕西青年职业学院、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作为全日制的高等院校也早在本科院校中开设了青年学。”^[5]此外,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还曾推荐“青年学”课程参加了2010年的北京市精品课程评选活动。

总之,经过学者们的持续努力,青年学日益受到各界关注,并不断有相关学科的参与和融合,其中尤以社会学对青年学的影响更为明显。这突出地体现在,参与青年学构建的研究队伍中社会学学者较多;在与青年学相关的研究成果中社会学视角的也较多。以致有学者认为青年

学应作为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当然,青年研究或者说青年学的继续发展,毫无疑问需要社会学视角的介入,同时也需要多学科参与和融合。

三、青年研究需要多学科参与和融合

“复杂性思维”倡导者莫兰曾经指出:“我们的知识是在学科之间被分离、肢解和箱格化的,而现实或问题愈益变成多学科性的、横向延伸的、多维度的、跨国界的、总体性的和全球化的。”^[6]也就是说,单学科是不能满足时代发展需要和社会发展需求的,对于青年研究来说同样如此。

首先,多学科介入有助于展现青年的丰富性和完整性。“就青年本身来说,是以模糊不确定性、动态多变性为主要特征的‘灰箱’。”^[7]青年作为特定生命状态,无论是对青年现象的研究,还是对青年本质的探讨,抑或是对青年发展的分析,由于其所具有的丰富性、复杂性、动态性、多边性和发展性等特征,如果用单一的学科方法去分析和研究青年,很难给我们呈现出青年本身的复杂面相,很难解读出青年内心的丰富情感。只有用多学科视角去解释青年的本质和成长规律,呈现青年的内心及周遭世界,才有助于我们整体地分析和理解青年。比如,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社会融入的研究,就离不开社会学、统计学、心理学等学科的视角;对乡村“混混”生长逻辑的研究,就少不了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

其次,多学科融合有助于化解复杂的青年问题。青年问题本质上是社会问题,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一些隐性的青年问题显现出来,青年所需要面对的挑战也越来越多,解决青年成长中的“烦恼”,毫无疑问需要多学科交叉与融合。青年研究的多学科介入,有助于我们在对复杂的社会问题进行“解剖”时形成科学、全面和系统的策略。比如,对于蚁族群体发展困境的研究,就需要行政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社会工作等学科参与,进而提出综合性解决方案,最终使得影响和制约蚁族成长的复杂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最后,多学科融合有助于更好地认识青年自身、坚守青年本位。现代意义上的青年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青年本身具有复杂性,辩证地、全面地认识青年需要有多学科视角。单以青年的产生为例,就有学者指出:“关于青年的产生过程,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都在各自的探讨中做出了不同方面的贡献,对青年的有关方面及其规律得出了很多独特的发现和揭示。”^[8]单学科视角下的青年或许能呈现出青年现象或问题的某一面,或许能做到某种程度上的“片面的深刻”,但对于青年自身、青年本位的理解来说仍然是不够的。恪守青年本位,更好地认识青年,无疑需要多学科参与和融合。

就当前青年研究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教育学、人口学等学科都对青年研究有所介入并产生了诸多成果。这类成果,既体现为各个学科学者对于青年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介入与探讨,并因此提出了青年社会学、马克思主义青年学、青年教育学等学科主张;也体现为青年研究上的多学科参与,社会学、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学、心理学、人口学对青年现象、青年问题和青年发展等研究都有涉及,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为我们正确地认识、解读和理解青年,解决青年发展中所出现的复杂性问题,推动青年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视角。

尽管青年研究已有多学科参与和融合实践,但与青年自身的复杂性和青年研究的专业化要求相比,当下多学科交叉和介入还显得不足。这一点,从青年学在行政上的“合法性认可”历程可见一斑。在关于青年学学科归类问题上,既有把青年学归于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文化学、心理学的,也有认为青年学应当是一门独立学科的。关于青年学学科归类的认识观点各异,均源自认知者的学科背景和知识谱系,这些观点对于青年学构建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但是,青

年学真正受行政认可不足。20世纪80年代,国家教委高度重视青年学并把青年学列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一门必修课,以培养合格的思想教育专业人才。后来,在国家颁布的学科标准中,又将青年社会学专门作为三级学科设条码编号,列为社会学专业的分支学科。可见,青年研究或者说青年学的多学科参与和融合还有极大空间,还有较长的路程要走。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青年研究就是一个需要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政治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多学科视角审视与介入的研究领域;运用多学科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是青年研究的基本需求。”^[9]

四、推进青年研究学科化、专业化发展

推进青年研究学科化、专业化发展,是青年研究走出困境的需要,也是青年学学科构建的必然,需要在以下方面努力。

首先,学习贯彻习近平青年工作思想,积极落实《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青年兴则民族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党和国家一向重视和依靠青年,关心和信任青年,广大青年在参与革命、建设与改革事业的过程中得以快速成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青年的成长和发展,并对青年工作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形成了习近平青年工作思想。“习近平青年工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青年观新时代的发展,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内涵,是对我国青年工作实践的理论表达,也是我国青年工作的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10]学习贯彻习近平青年工作思想,就要学习把握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地位、历史作用和时代使命的论述,关于青年理想信念的论述,关于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论述,关于青年教育的论述,关于共青团工作的论述,关于青年创新创业的论述”^[11]。习近平青年工作思想为青年工作和青年研究指明了方向。为了更好地“照顾青年的特点和利益,优化青年成长环境,服务青年紧迫需求,维护青年发展权益,促进青年全面发展,引导青年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自觉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更好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该规划特别强调,要在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高等学校加强青年学研究。因此,加强青年学研究,无疑是落实《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的重要举措之一,也是推进青年研究深入发展的需要,必须加快推进。

其次,聚焦青年研究方法的专业化,推动青年研究从“空洞说教”到“实证说理”的成功转型。青年研究的专业化规范化发展,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研究方法的专业化。青年研究作为一种政策研究,早期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大多作为一种思想政治工作来研究,空洞说教的多,用数据、模型等讲故事、讲道理的少。近年来,青年研究专业化规范化有所突破,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用专业方法推进青年研究,尤其是青年社会学等学科的推动,给“实证说理”的青年研究做出了榜样。有学者对20世纪90年代的青年研究方法做过论述,认为:“青年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八十年代初期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二是八十年代中后期以学科建设为主攻方向的研究,三是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用实证手段对青年状况进行宏观描述,并试图建立青年研究的指标体系的‘准规范’研究。”^[12]也就是说,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以问卷调查、数据分析等为主的定量研究方法,开始进入到青年研究领域并日渐成为主流。近二十年来,中国青年研究在哲学社会科学整体繁荣发展的背景下高歌猛进,学科研究方法也日益受到重视,涌现出很多关于学科方法专业化规范化的讨论与思考,一些新的青年研究方法,比如叙事研究手法日渐进

入青年研究领域,并陆续推出了一批成果^①。辩证地、完整地解读和理解青年,今后的青年研究需要更多地运用问卷调查、田野研究、深度访谈等方法,真正走近青年,着力对青年群体进行深度解读,极力推动青年研究方法从“空洞说教”到“实证说理”的成功转型。

再次,打造青年研究共同体。“经过四十年发展,中国青年研究如何在学术界得到专家学者的认可,这是青年研究界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13]当前,青年研究范式存在缺失,青年研究共同体并没有真正形成。因此,在学术场竞争中,青年研究的影响力还很有限。比如,青年与社会关系密切,很多社会问题往往就是青年问题。然而,青年研究专家在这些问题上的发声和影响却还不够。与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相比,青年研究力量的增长速度难以满足这种需求,急需推动构建青年研究学术共同体,积极推进青年研究,推动青年学构建,培植青年研究队伍。要针对“青年研究队伍年轻化趋势明显,名老专家不多”的状况,积极培育一批专门从事青年研究的中青年骨干队伍,加强和推动青年研究专家学者之间的对话和交流,为青年研究培植中坚骨干力量。

最后,推动青年研究与青年自身话语体系的统一。在当前的青年研究中,由于部分学术研究没有真正立足于社会文化的发展与变迁,与青年自身的特点、需求存在隔膜,不能找出青年问题出现的社会根源,青年研究与青年自身话语之间存在脱节的情况。为此,推进青年研究学科化、专业化发展,就要推动青年研究在范式上的变革、在话语上的转化。不能总是用应然的态度去看待,要看到青年研究的实然状态。要有青年本位意识,站在青年的立场上解读青年,站在青年的本位上理解青年。尽管“在由不同学科和文化背景的学者组成的青年研究学术共同体中已普遍达成了共识,青年研究须以青年为本,青年要出场或在场,研究者只提供平台,展示青年自身,而非研究者的意愿或主观判断”^[14],但真正落实青年意识、青年本位,以青年视角研究青年,还需要持续努力。毕竟,“当青年研究不能以青年视角去体察去感受他们的生活和内心世界的骚动,不能以青年本体为出发点,这样的青年研究只能说是徒有其表。”^[15]因此,推进青年研究学科化、专业化发展,就要站在青年立场上,积极推进青年研究范式变革,构建青年研究独特话语体系,而不是停留于做某些学科与问题的“边角料”。

[参 考 文 献]

- [1][4]何绍辉《论青年研究的学科化》,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2]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载《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
[3]李春玲《社会变迁与中国青年问题——中国青年社会学的关注点及研究取向》,载《青年探索》2018年第2期。
[5]洪守义《青年学:走向自我完善的新兴学科》,载《当代青年研究》2007年第10期。
[6]埃德加·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陈一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8页。
[7]金大陆、陆新和《青年学——一个灰色的系统》,载《当代青年研究》,1987年第1期。
[8]沈杰《现代性进程中的青年发生与演变》,载《北京青年研究》2018年第1期。
[9][13]刘宏森《青年研究:在关注现实和梳理历史中提升》,载《社会科学报》2018年3月1日。
[10][11]乔东亮、李雯、李新利《习近平青年工作思想论析》,载《北京青年研究》2017年第4期。
[12]张华《关于青年研究的思考与前瞻》,载《青年研究》,1997年第2期。
[14]李浩《青年研究“场域”的选择维度》,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
[15]陈亮《我们的青年研究缺什么》,载《浙江青年专修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责任编辑:王俊华)

^① 为此,有学者认为要推动“青年研究的叙事转向”,并认为青年研究的叙事转向有助于青年研究视角从“问题本位”转向“青年本位”,青年研究范式从“宏大叙事”转向“个体叙事”,青年研究关系从“主体与客体”转向“主体间性”。具体可参见林楠、吴佩婷《青年研究的叙事转向》,载《当代青年研究》2017年第4期。